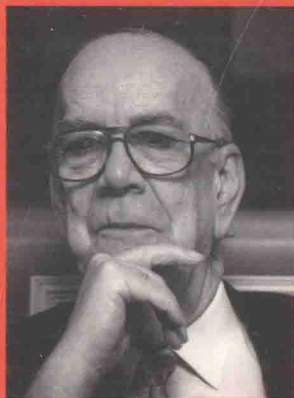


NOBEL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

1989 / Cela

为亡灵弹奏 玛祖卡



(西班牙) 卡米洛·何塞·塞拉 著

李德明 译

*Mazurca Para
Dos Muertos*

Camilo
José

Cela

漓江出版社

(西班牙) 卡米洛·何塞·塞拉 著

李德明 译

为 玛祖卡

玛祖卡



漓江出版社

桂林

MAZURCA PARA DOS MUERTOS

© CAMILO JOSÉ CELA, 1983 and Heirs of CAMILO JOSÉ CELA.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4-1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亡灵弹奏玛祖卡/(西班牙)卡米洛·何塞·塞拉(Camilo José Cela)著;李德明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407-7516-2

I. ①为… II. ①塞…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4472号

组 稿:陆 源

责任编辑:陆 源 郁陈琳

装帧设计:居 居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2306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850mm×1 230mm 1/32

印张:9.25 字数:250千字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Camilo José Cela

Mazurca para dos muertos

西班牙新小说的先驱

——“塞拉作品系列”前言

林一安

1942年,在西班牙内战后岑寂而压抑的文坛上,出现了一部篇幅不大、标题也不醒目的中篇小说:《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但是,人们在阅读之后,却不禁为作者的胆量暗暗吃惊。

小说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出,前后还加了重抄者(即发现和整理这部回忆录手稿的人)的说明,以期造成“真实效果”;其实,故事并不复杂:回忆录的作者即小说主人公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是西班牙一个乡村小镇的青年,他善良、淳朴,对未来满怀憧憬。但不幸的是,他的家是一个贫困、愚昧、落后的家庭。父亲年轻时是个走私犯,被判过刑,坐过牢,出狱后,意志消沉,终日狂喝滥饮,任意打骂妻儿,借以发泄。家人对他十分厌恶,但慑于他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一天,他狂犬病发作,家人积聚在心头的怨恨终于有了宣泄的机会:他们用暴力将他关进壁橱,把他活活折磨死了。母亲是个目不识丁的村妇,既愚昧无知,生性又剽悍粗野。面对丈夫的凌辱,她毫不示弱,总是以牙还牙,棍棒相迎。她对子女冷酷无情,从未施过母爱。她的小儿子智能低下,肢体残缺,是她与人私通的产物。当她的情夫狠踢这个小可怜虫时,她竟放声大笑,毫无怜悯之心。帕斯库亚尔从小也受到父母的虐待,享受不到人间的

温暖。他一生坎坷,命运多舛;好不容易结婚成家,可外出度蜜月时,他和妻子同骑的一头母马受了惊,导致婚前受孕的妻子小产。帕斯库亚尔在盛怒之下用刀捅死了母马。后来,他的妹妹和妻子遭到流氓埃斯蒂劳侮辱,他气愤已极,便与之决斗,将他活活踩死。帕斯库亚尔于是被判处二十八年徒刑。服刑期间,他表现良好,满心希望重新做人,后被减刑为三年,期满释放。谁知出狱后,他因不堪忍受恶毒的母亲的骚扰,终于用柴刀将这个给家人带来许多不幸和屈辱的泼妇杀死,从而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被处以绞刑。

这部小说的作者就是 1989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班牙著名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当时,他年仅 26 岁,只发表过一本诗集,题名为《踏着白日犹豫的光芒》(1935),在西班牙文坛可以说是无名小卒。

可是,就是这位小青年的这样一本薄薄的小书,却在西班牙闹出了一场轩然大波!文学界反响巨大,一时间好评如潮,一致认为此书一扫内战后西班牙文坛沉闷而萧条的空气。西班牙著名文学评论家贡萨洛·索贝哈诺认为:“《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的问世,一举证明了西班牙小说界蕴藏着巨大的新的活力,为复苏和重建西班牙现代小说奠下了第一块基石,同时也从根本上扭转了 40 年代西班牙读书界只注重外国翻译小说的兴趣。”^①而且,塞拉在这部中篇里表现的自然主义倾向,还被一些文学评论家称为“可怕主义”或“可怕现实主义”。这是因为,小说中除了有大量令人毛骨悚然的残忍行为描写之外,还有意扭曲人物的形象,有时甚至把人的行为和动物的行为等同起来,造成一种厌恶感,从而深化读者对这种行为的厌恶,进而憎恨形成这类行为的社会诱因。有的评论家指出,就美学意义和叙事艺术而言,《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

^① 贡萨洛·索贝哈诺:《当代西班牙小说》(1975),第 33 页。

一家》一书也是对传统的有力挑战和成功背叛：它彻底变更了读者一味接受、叙述者无所不知、故事情节按部就班地发展、小说结构四平八稳等陈旧程式，为西班牙新小说的拓展开开了风气之先。

当时，西班牙法西斯势力已夺取政权，正受到其御用文人的一片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肉麻吹捧和疯狂鼓噪，塞拉居然创作出这样一部揭露人间黑暗，唤起社会控诉的小说，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该书也立即遭到官方和教会的强烈指责，后来还被查禁。其实，原因也很简单：这部作品表现了战后西班牙人民的幻灭和绝望，而它要告诉西班牙人民的是，西班牙社会内部沉积着一种愚昧落后的文化，这样的社会只会窒息人性，是造成现实罪恶和冤冤相报的冲突的真正祸根，而毫无人性的法西斯政权连同它那严密控制的书刊检查，更是扼杀人性乃至新生命的绞刑架和刽子手。

事情闹得天翻地覆，人们自然会把好奇的目光转向胆大包天的青年作家身上。人们这才搞清，这个年轻人全名为卡米洛·何塞·塞拉·特鲁洛克（Camilo José Cela Trulock），1916年5月11日出生于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地区拉科鲁尼亚省帕德隆市伊里亚——弗拉维亚县，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兼有英国和意大利血统。

九岁时，塞拉随全家移居马德里。进入大学后，曾攻读法律、医学、哲学和文学。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塞拉中途辍学，离开马德里，参加佛朗哥的军队，当了一名士兵，糊里糊涂地替法西斯卖命。然而，血腥的无意义的杀戮和人性的扭曲强烈地震撼了他，使他醒悟。1939年内战结束后，他开始反省那场战争，认识战后的现实和人生。塞拉退役回到马德里后，为谋生计，曾当过小公务员、画匠、电影演员、斗牛士，甚至柔道教练。广泛丰富的阅历为塞拉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厚实的素材。

长期内战后的西班牙，满目疮痍，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但在法

西斯政权的文人墨客粉饰下(佛朗哥本人就带头写了一本为反革命内战歌功颂德的“小说”),广大民众受到蒙蔽和欺骗,一时不明真相。这时,塞拉毅然推出《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这样一部血淋淋揭示人性扭曲的作品。应该说,这同时也是作家在思想认识上觉醒的一个飞跃。作家深刻地告诉读者,原来秉性善良的人之所以沦为冷酷、凶残的杀人犯,走上绞刑架,乃是恶浊的社会环境使然。这才是灭绝天良的真正祸首元凶!

这部小说当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作品中的一些自然主义或“可怕现实主义”的描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读者对西班牙社会现实的憎恨,从而激起一股颇有影响的社会抗议浪潮,但同时也造成了读者沉重的心理负担和消极的反感情绪。另一方面,作品中有不少情节描写、人物的心理刻画乃至形象塑造都没能充分展开,因而显得简单、稚嫩甚至牵强,比起40年代即被国际文坛“重新确认”的一些拉丁美洲小说来,如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和《玉米人》、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的《人间王国》,似乎就稍逊一筹了。

然而,如果考虑到塞拉当时所处的艰难的社会环境以及他对西班牙战后小说所起的作用和影响,那么,认为他的这部中篇“开创了西班牙小说的新阶段”^①,应该说不失为一种公允的评价。

1951年,塞拉花了五年时间写成的重要长篇小说《蜂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不仅受到西班牙读者的广泛欢迎,而且还引起了最为苛刻的文学评论家的注意。

小说共分六章和一个尾声,描写的是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不久而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时的马德里下层社会。故事发生在1942年

^① 马利亚诺安托林·拉托:《圣卡米洛:文学巨星》,西班牙《变革16》杂志,1989年10月30日,第8页。

12月短短的三天里：青年诗人马丁失了业，生活无着，终日放荡不羁，无所事事，出入饭馆酒肆，打发日子。有一天，他在罗莎开的小咖啡馆里吃了东西而付不出钱，被老板娘当众逐出门外。小说以此为线索，围绕着活动在小咖啡馆周围的三百余名各色人物展开，其中有工人、职员、医生、警察、小贩、妓女、流氓、跑堂的、放债的、巡夜的、擦皮鞋的……三教九流，纷繁复杂。小说最后以妓女马戈特被人在厕所里勒死，警察准备传讯马丁作为结束。

小说不仅隐喻这家咖啡馆活像一个营营不息地骚动着的蜂房，战后西班牙普通百姓整日为生活忙碌奔波，仿佛一只只疲于奔命的蜜蜂，饱受贫困、饥饿、绝望、空虚等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而且还通过描写这些芸芸众生之间只知金钱和情欲而不知其他的冷漠关系，刻画出他们孤独、隔阂的心态，暗示他们好像被禁锢在一个个六角形的蜡巢里，坐以待毙。

西班牙著名文学评论家安赫尔·巴桑塔认为，除了深刻的社会意义外，《蜂房》一书在写作技巧上“也不愧为西班牙小说中最为杰出的作品”，“开创了西班牙小说的新时代”。^①

综观全书，这部小说在艺术手法上有四大特点。一是客观主义的描写。塞拉本人承认，“我的这本小说……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准确地一步一步地加以描写的。”^②因此，无论叙事写入，还是状物绘景，都由一个叙述者客观地、不加议论地从客观的角度进行客观的镜头摄取或笔头记录，然后加以播发或报道。可以看出，作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希图完善他在《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中尚嫌稚嫩的笔锋。促成艺术上更为完善的“真实效应”。然而，笔者认为，书中对于众多人物的介绍，仍然存在着某些电影说

① 安·巴桑塔：《西班牙小说四十年》（1979），第12页。

② 塞拉：《蜂房》，中文版，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

明书或履历表式描写的痕迹,作家似乎没有完全摆脱过去那种“简单”的窠臼。

二是“摄影机眼”的引进。“摄影机眼”是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首先倡导运用的。他在他的许多作品里,特别是在192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曼哈顿中转站》中采用了这种写作手法。根据这种技法,作家仿佛长了一双电影摄影机一般的眼睛,对他笔下的人物,可以运用全景、远景、近景、特写、融入、切入、闪回等多种影视手段来加以刻画描绘,因而灵活生动,效果真实。许多文学评论家认为,塞拉显然深受多斯·帕索斯的影响,在《蜂房》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技法。

三是集体主角的巧妙运用。全书合中文仅20万字,但出场人物却有346位之多。这些人物基本上可以说只有上场先后之别,而无主次之分。巴桑塔认为,这些众多的人物都极其重要,都可胜任主角,因而可称为“集体主角”。这是塞拉十分大胆的、在西班牙战后文坛不失为一种独创的尝试。如果没有驾驭文字、封画人物的深厚功力和准确把握,作家是绝不会贸然行事的。在塞拉笔下,这浩浩荡荡的各色人物性格各异,形象鲜明,血肉丰满。有的人物,作家虽没有用浓墨重彩,但寥寥数笔,便活脱脱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形象来。

四是时空的转换和压缩。全书的情节并不一一按时间和场景的顺序排列,作家往往采用倒叙、跳叙以及同步、并置等一系列新颖的时空描写手段处理,因而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效果,同时也增强了读者的参与意识。

《蜂房》显然又是一部对社会的控诉书,因此未出版就遭到当局查禁,不得不在阿根廷出版。直到1962年,才获准在西班牙本土发行。然而作家却因此声名大振,进一步奠定了他在西班牙文学界的重要地位。1982年,此书由西班牙著名电影导演卡穆斯搬

上银幕,作家重操旧业,在影片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塞拉于是举国闻名。

1983年9月,塞拉另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为亡灵弹奏玛祖卡》问世,作家由于这部作品而获得1984年设立的西班牙全国文学奖。塞拉通过西班牙内战期间一桩谋杀案及其复仇事件的描写,生动地反映了加利西亚山区居民的生活及其政治倾向。作家巧妙地运用了加利西亚方言,把西班牙西北部这一地区的民俗风情描摹得淋漓尽致,充溢着浓郁的地方色彩。

故事围绕着加利西亚一偏远山区的两大家族派系展开。古欣德家族世代居住此地,因血缘相近,后代长相古怪:两排稀松的牙齿配上一张长长的马脸。但他们彼此和睦团结,友善相处,其中大多数人以种田、打猎、捕鱼为生。另一些居民是从外省迁来的卡罗波人,他们长相也很特别:额头上都有一块猪皮样的印记,犹如工厂产品的商标或者坏人标签。他们从事的是“坐着干活”的行当,如修鞋匠、裁缝、药材店伙计等等。

内战烽烟四起,波及加利西亚。原来就有宿怨的古欣德人和卡罗波人关系日趋紧张。卡罗波人法比安·明盖拉认为铲除对头的机会来了。他的死敌是古欣德人巴尔多梅罗。这小伙子胆识过人,勇猛异常。最令人惊异的是他前额上生有一块会变色的星形斑痕,有时它会发出红色光芒,有时变成晶莹剔透的黄玉,有时仿佛玲珑剔透的翡翠,有时又宛若洁白无瑕的钻石……由于巴尔多梅罗的孔武英勇和神奇色彩,他在当地享有极高的威望。法比安对他又恨又怕,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一个阴云密布的夜晚,法比安纠集一帮歹徒,将巴尔多梅罗父子抓获,残害致死。消息传到在帕罗恰妓院拉手风琴谋生的盲乐师高登西奥耳里,他第一次弹奏起玛祖卡舞曲,为姐夫和外甥哀悼。三年后,古欣德人举行家族会议,决定由巴尔多梅罗的二弟塔

尼斯执行报仇决定。塔尼斯武艺高强,皮肤长得跟钢铁一般坚硬。他接受命令后便伺机行事。一天,他带上两条训练有素的大狼狗,找到了正在河边喝水的法比安。狼犬猛扑上去,咬住要害,法比安一命归阴。高登西奥获悉后,第二次奏起了玛祖卡舞曲,乐声通宵达旦。

这部长篇小说,是塞拉文学创作“革新意识”相当全面的展示。西班牙著名文学评论家鲍尔·伊列在论述塞拉的文学创作时概括道:“塞拉多产,但不重复自己;他多变,但每变均有开创。”^①这段话,同样适用于《为亡灵弹奏玛祖卡》。

这部小说并不分章,为保持故事的连贯和完整,从头到尾,一气呵成,只是最后附了一份法医解剖法比安尸体的验尸报告。西班牙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这部小说是塞拉晚年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可以列为西班牙当代小说的经典作品。

确实,这部别具一格的小说具有更为深邃的思想内涵。作家向读者展示的绝不仅仅是血肉模糊的尸体,凶狠野蛮的残忍行为,报仇雪恨的杀戮场面,从而造成人们胆战心惊的“可怕主义”感觉;作家也绝不是企图借助一些肆无忌惮的打情骂俏,粗俗村野的情爱镜头,激起人们的感官冲动。我们从作品中可以明显地体味到,作家强烈地谴责这种迷信、粗野而毫无理智的鲁莽行为。他所探讨的乃是人类的前途。他力图揭示在封闭、愚昧、落后、与世隔绝的社会环境里,在内战狼烟蔓延的阴影下,西班牙民众的生存状态。作家认为,西班牙人犹如一头伤痕斑斑的、被猎叉紧紧卡住脖子的野兽在进行绝望的挣扎。这无疑又是一幅触目惊心的悲惨图景!塞拉对内战所引起的西班牙民众人性的扭曲感到深切的忧虑,对西班牙的前途满怀憧憬而又惴惴不安,他公开谴责佛朗哥的

^① 西班牙《国家报》,1989年11月3日。

行政机构,骂它是“蛀虫”、“猛于山间野兽”……我们不难看到,在塞拉的胸膛内,跳动着一颗祝福西班牙、祝福人类的善良心灵。

在写作技巧上,塞拉除了保持他原有的风格和特色之外,还作了许多新的尝试和探索。

在人物的刻画上,他适当地运用了盛行于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给作品蒙上了一层神奇色彩,例如写卡罗波人额头上长有一块猪皮样的印记,古欣德人巴尔多梅罗额头上生有一块会突出各种鲜艳色彩的星形斑痕……这完全改变了塞拉在他过去的小说中常用的客观描摹的手法,而多少糅进了作家的主观色彩,因为对卡罗波人流露出厌恶的情绪,而对巴尔多梅罗则倾注了钦佩和同情,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为亡灵弹奏玛祖卡》中,象征主义手法运用得比较成功的当首推贯穿全书始终的关于雨的描写。那是一种牛毛细雨,它连绵不断,无始无终,下得人们失去了耐心,甚至失去了脾性,使得人无可奈何,逆来顺受,完全“磨”没了棱角,变得混混沌沌,碌碌无为……作家在这里岂不是向读者暗示,在长期落后、愚昧、封闭的社会禁锢下人性扭曲的缘由?作家在这里岂不是告诫人们,生活在这样恶浊的环境里,不但不能自我拯救,不能自拔,反而会自取灭亡,越陷越深?

积极参与作品中人物的活动,是塞拉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作家在网罗人事、编织情节时,往往亲临其间,成为众多人物中的一个角色。但是,作家的出场,常常是有目的性、选择性的,塞拉显然愿意和他笔下倾注同情的人物往来。这点,在《为亡灵弹奏玛祖卡》中体现得尤为显著。塞拉在这部作品中被人们视为可信赖的人物,所以,巴尔多梅罗的母亲阿德加一有机会便与他对话,吐露心事,倾诉不幸。在以往的小说中,作家用第一人称笔法把自己融入角色的例子,似乎并不少见;然而像塞拉这样在客观的描写中揉

进自己的写法,倒还不多见。

总之,这是一部手法细腻、剪裁适当的作品,当然,小说中仍然有些许履历表式的人物介绍和不太必要的性描写,但毕竟瑕不掩瑜,相信读者自会有公允的评价。

塞拉的其他中篇小说还有:《憩阁疗养院》(1943),《小癞子新传》(1944),《考德威尔太太和儿子谈心》(1953),《圣卡米洛,1936》(1969),《寻找阴暗面的职业,5》(1973)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圣卡米洛,1936》。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对西班牙内战的反思。故事集中于1936年7月18日前后展开。作家运用主人公的长篇内心独白,即故事叙述者面对镜中的我,以第二人称“你”向自己发问,追究谁是挑起这场内战亦即所谓“杀戮”的肇事者。作家得出的结论是:“……所有的人……我们都是内战责任的承担者。”

总之,中篇小说是塞拉文学创作领域中的强项,其特点就是革新意识强烈,多变而又有所开创。

塞拉还著有《飘过的那几朵云彩》(1945)、《风磨》(1955)、《十一个有关足球的故事》(1963)等多部短篇小说集。这些短篇描述了西班牙战后“饥饿的年代”里首都马德里的小市民生活,除了揭露小市民的庸俗、狭隘、投机和彼此之间的争斗之外,还写出了他们在艰难时仗义相助的热肠;此外,还可以欣赏到塞拉笔下的人物在窘境中开善意玩笑的西班牙式幽默,亦即西班牙人苦中求乐的开朗性格。

通观塞拉的文学创作,可以认为,他的风格是在西班牙古老文学传统中融合了旷达豪放的笔法以及激情和责任。1989年10月19日,瑞典文学院在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塞拉时说,这是“由于他的作品内容丰富、情节生动而富有诗意”,“他以风格多样、语言精炼的散文作品含蓄地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们”,“他是西班牙战后年代里,在西班牙文学革新方面一位举足轻重的人

物”。

消息传开,西班牙举国欢腾。首相冈萨雷斯当晚即致电塞拉祝贺,并决定安排一个星期的时间让人们吹风管、放烟火、纵情歌舞。然而在国际文坛,却众说纷纭。哥伦比亚作家梅塞德斯·卡兰萨认为:“塞拉不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他最多不过是西班牙文学长期贫乏和普遍平庸时期的突出代表。”^①就连塞拉的同胞、著名诗人拉斐尔·阿尔贝蒂也颇有微词,他不客气地说:“别人更配得奖。”^②阿尔贝蒂所谓的别人,是指墨西哥的著名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阿尔贝蒂果然言中,这位大诗人于1990年获奖了),还有西班牙著名女作家、诗人罗莎·查塞尔。此说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即使在西班牙语国家即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里,塞拉似乎也并非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据西班牙语文学界的普遍看法,他的名字要远远排在墨西哥的帕斯和富恩特斯、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乌拉圭的奥内蒂、阿根廷的萨瓦托、智利的多诺索等著名作家之后,更不消说在欧洲、美国和巴西(用葡萄牙语),还有一大批咄咄逼人的角逐者,如英国的格林和奈保尔,德国的格拉斯,意大利的莫拉维亚,捷克的昆德拉,美国的阿瑟·米勒和欧茨,巴西的亚马多。

塞拉本人在获知自己得奖后平静而谦逊地说:“我认为,一切把全部生命投入文学事业而毫不计较任何形式的名利的作家都可以享受这一殊荣。这次轮到了我,我感到十分荣幸,但更感到责任重大。”^③

确实,无论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还是它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技巧,比起国际知名的许多文学大师来,塞拉也许并不是一名强者,

① 西班牙《变革16》杂志,1989年10月30日,第23页。

② 西班牙《变革16》杂志,1989年10月30日,第22页。

③ 西班牙《国家报》,1989年10月21日。

但是诺贝尔文学奖常常不是对所有作家的公正裁判,更不是最后的评价,它不过是世界文坛众多文学奖当中一项影响较大的荣誉。即便塞拉没有获得此项殊荣,只要认真考察塞拉的生平和他的文学创作,就应该公允地承认,他毕竟是一位严肃的作家,而且在西班牙,他的确是排名第一位的小说家,并且公认是继塞万提斯之后作品被人们读得最多的一位作家。西班牙文学界赞誉他复苏和重建了西班牙文学,是西班牙新小说的先驱,开辟了一代文风,也并非完全是溢美之词。塞拉本人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表示,他决不会改变他的充满激情和责任的创作风格。人们有理由认为,这不仅是一种性格、一种信心,更是一种职责。

……我们的思想干枯而又麻痹，
我们的记忆干枯而又可疑。

——埃德加·爱伦·坡,《尤娜路姆》